

今日为学社开学之日

即是前学社告之文(一)切演作之始末。

我所演说者，

学社品格，当属于通俗语所谓学堂一类。

蔡元培文选

张汝伦 编选

经典·现代卷

蔡元培文选

张汝伦 编选

我所演说者，
今日大学所开者一也。

学社品格，当属于通俗语所谓学堂一类。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蔡元培文选 / 张汝伦编.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2

(远东经典. 现代卷)

ISBN 978 - 7 - 5476 - 0570 - 7

I. ①蔡… II. ①张… III. ①蔡元培(1867 ~ 1940)—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4414 号

责任编辑: 刘丽娟

封面设计: 李 廉

远东经典·现代卷

蔡元培文选

编选者: 张汝伦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 200336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332 千字

印张: 14.25

ISBN 978 - 7 - 5476 - 0570 - 7/G · 415 定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 - 62347733 - 8555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蔡元培

(代编选者序)

张汝伦



严格地说,编一个思想家的文选应该是对其思想的一种阐释方式,尤其如果这个思想家著作等身,且涉及面广,影响大时,就更是如此。全集的好处是照单全收,不留予遗,给研究这个思想家提供了完整的第一手资料。不过全集就像采来还未及加工的矿石,固然很有价值,但若发挥影响和作用,则必须再进行一番筛选。对于研究思想的学者来说,那些难以避免的纯粹应酬文字显然是多余的东西。精心选编的文选虽无面面俱到的好处,但却是从一个特定角度来集中选录一些有关文字,既便于读者的理解和把握,又突出了思想家在某些方面的过人之处和价值。这是我选编这本《蔡元培文选》的基本出发点。

然而《蔡元培全集》已经问世,他的哲学文选、美学文选和教育文选也早已出版,后两种文选还各有不同的版本。在这种情况下,再编一本《蔡元培文选》是否值得和必要?时下从生意眼出发胡编名人文集已成风气,但这正是我所不屑的。

然而,当有朋友建议我来选编一本《蔡元培文选》时,我却欣然接受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蔡元培作为一个重要的近代

思想家及其在近代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与贡献长期以来一直被忽略了。这只要看一下我们所能见到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就可以知道了。人们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对他领导北大的成就尤其津津乐道,赞不绝口。但对他教育思想的研究往往停留在他一些具体的教育主张上,而未深入这些主张后面有时并未明言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哲学。人们也研究谈论他的美学思想,却很少探讨美学在他全部思想中的作用和意义。除此之外,对蔡元培思想的研究就不多见了。这与他在其同时代人心目中的地位相当不相称。陈独秀在《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说,蔡元培、胡适和他自己是要对五四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可是,近年对陈、胡的研究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却少有把蔡元培作为一个主要的近代思想家来系统研究的文字。这似乎说明,蔡元培作为一个主要和重要的近代思想家的地位,实际并未得到人们的承认。选编这本《蔡元培文选》,是希望读者通过研读收在这本选集中的蔡元培的文字,能对蔡元培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有一个新的评估和认识,并进而对现有的近代思想史本身也能有若干反思和质疑。

二

无论从哪方面看,蔡元培无疑都属于主要的中国近代思想家之列。他的重要不仅在于他曾对他所生活时代的思想文化发挥过重要作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还在于他代表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种重要但却被遗忘、忽略或贬低的思想倾向。陈独秀和胡适虽然在思想倾向上有重大不同,但在不少重大的文化思想问题上,他们的立场是基本相近或一致的,尽管我们现有的近代思想史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作为同样在五四时期产生过

重要影响的思想家，蔡元培与陈、胡不仅在思想倾向上有重大不同，而且在一些重要问题的基本看法上，也有重要不同；在各人的文化活动实践上，更有不同。这种重要的不同却因为五四时蔡元培正巧是北大校长，并写了那封著名的答林琴南函而往往被人忽视。这两个忽视是发人深省的。我们熟悉的思想史叙述方法是非此即彼的两分法。既然蔡元培支持新文化运动，当然他就是陈、胡的同道。却未看到维护陈、胡不受外界攻击，并非等于与他们在思想立场上完全一致。胡适之也反对过蔡元培“兼容并蓄”的立场。非此即彼的二分叙述模式之不适用于蔡元培，既说明这种叙述模式本身的问题，也说明了蔡元培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

虽然蔡元培比陈独秀和胡适要年长一辈，但从他们面临相同的时代问题来看，他们可以算同时代人。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中国和中国文化，以其深重的危机向一切有思想的人提出了国家与文化的前途与命运的重大问题。但现实政治的危机以其现实性和急迫性遮蔽了同样深重的文化危机。人们往往是从政治危机才推导出和感觉到文化危机，而没有看到，一个从未与另一种高度文明的文化大规模接触，并且经过几千年的延续和发展早已失去其自身更新变革机制和因素的文化，一旦面对另一种具有多方面优势的文化时，不可能不发生根本动摇。但现实问题的紧迫性使人无暇在更深的层次上考虑问题。救亡图存成了压倒一切的任务和知识分子考虑的中心问题。蔡元培也不例外。目睹清政府的腐败和毫无希望，他毅然放弃自己的功名前途，直接投身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握笔的手居然也去造炸弹，谦谦君子“老好人”也鼓吹过暗杀。

但严格说来，蔡元培不是革命家。“迅速改变”或“根本解决”从来不是他的基本立场。他认为光有政治体制方面的变革

是远远不够的,社会种种问题要靠学问,也就是科学来解决。另一方面,人的素质也关系到国家兴衰,“盖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①。因此,“文化与物质生活之改造同时重要”^②。因此,早在五四运动请出“德”、“赛”两先生前七年,即辛亥革命一结束,他就在《社会改良会宣言》中提出要“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迷信”^③。在他看来,更为根本和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和文化问题。改造社会,先要改造教育;挽救危亡,先要从学术方面努力^④。这是蔡元培对自己所面临的时代问题的一个基本考虑。

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况下(直到今天恐仍是如此),一谈文化问题,就必然涉及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问题。之所以如此,除了其中掺杂着大量复杂的政治因素外,还在于人们把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截然对立起来,事实上,它们不仅有本质的区别,还有价值的区别。前者往往和“旧”、“古代”、“落后”甚至“迷信”相联系,而后者则是“新”、“现代”、“进步”和“科学”的象征。当然,对于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说,这种价值区分则另有一套。但“截然不同”往往是不同立场人的共同预设。蔡元培则不然。他完全没有截然对立的中西文化观或新旧文化观。他相信人类既然有共同的经验,就会有普遍的原理,人为划分中西、新旧的畛域,用西学打倒中学,或用中学抵制西学的态度是他坚决反对的。他认为,“主张保存国粹的,说西洋科学破产;主张输入欧化的,说中国旧文明没有价值。这是两极端的主张”^⑤。他明

① 《蔡元培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中华书局版,第3卷,第8页。

② 《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219页。

③ 《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37页。

④ 《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491页。

⑤ 《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283页。

确指出：“科学之成立，率在近代，而人类经验之暗合学理者，则自昔为昭。……是故鉴旧学之疏，而以新学进之，则可。谓既有新学，而一切旧日之经验皆得以吐弃之，则不可。”^①所以他主张对文化要有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切忌盲从、守旧与空谈。在答复何炳松等人征求他们对他们提出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宣言的看法时，他写道：“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而改之。’这就是不守旧、不盲从的态度。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择怎样的善，怎样是人类公认的善，没有中国与非中国的分别的。怎样是中国人认为善，而非中国人或认为不善的；怎样是非中国人认为善，而中国人却认为不善的。把这些对象分别列举出来，然后可以作一文化建设的方案，然后可以指出中国的特征尚剩几许。若并无此等方案，而凭空辩论，势必如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标语，梁漱溟‘东西文化’的悬谈，赞成、反对，都是一些空话了。”^②

正因为不把中西文化截然对立，所以蔡元培对于中西文化坚持调和会通的态度。他念念不忘的不是不思变革的抱残守缺，或泛政治化的否定批判，而是积极的文化建设。因为这才是立国之本。而要建设现代中国文化，必须会通吸收中西两种文化的优秀成果方能有所成就。因此，无论对于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他都持一种理性的、批判的开放态度。蔡元培从小受的是典型的传统文化教育，耳濡目染，浸润很深。传统文化对他一生的思想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但他也清楚地看到传统文化本身的不足和停滞，尤其是在实验科学方面与西方相比，更是相形见绌。为此，他始终积极鼓吹“输入欧化”，并且还主张“欲输科

① 《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5页。

② 《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484页。

学智识于东亚，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①。他虽年届不惑，又曾有“翰林”、“总长”的头衔，却两度负笈西洋，实地研究西方学术。根据他在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听课记录，他最少一学期听四门课，最多时一学期听十门课。科目包括哲学、美学、文学、心理学、文明史、人类学、民族学等等。在1911年1月4日写给吴稚晖的信中他曾这样描写自己这段学习生活：

“至勉赴学问云云，则虽不敢不以此为鞭策，而来此已逾三年。拾取零星知识，如于满屋散钱中，暗摸一二相当之钱以串之，而顾东失西，都无着落。惟终日手忙脚乱，常若债负，与日俱增，而不知所届。偶或悍然不顾，引我无目的之乐天观，以强自排遣，则弟之避债台也。盖弟以前受中国读书人之恶习太深，年来虽痛自洗濯，而终未能脱去。又生平有小题大作之脾气，详于小不能不遗其大。自知其失而终又不能改，故沈游于苦海之中，而不能度也，所幸半佣半丐之生涯，尚可勉强过去。再历数年，或者摸得之散钱稍富，而渐有适当于断烂钱串者，得联合为小小之结束，则庶几不负故人之期望矣。”^②

从这段明显自谦的话中，亦可看出他当时学习西学的确下了一番苦功夫。正是由于这种认真虚心的态度，比起同时代许多出洋留学的人来，蔡元培对西方学术思想的认识和理解是比较透彻和深入的。“在革命元老中，我认为他比较真正认识西方思想。他书真正看，而思路通达。对西方思想有真认识，是不容

① 《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6页。

② 《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14页。

易,否则班门弄斧,人云亦云而已”^①。林语堂的这段话的确是十分中肯的评论。

但是,要不“班门弄斧,人云亦云”,光是认真学还不行,还必须始终有“我”,始终有自己判断和批评的头脑。而这正是蔡元培对待西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早在刚接触西学时,他就对别人说:“时无古今,地无中西,凡所见闻,返之吾益己益世之心而安,则虽阻之以白刃而必行;返之吾心而不安,虽迫之以白刃而不从。”^②他虽力主全面引进“欧化”,但又始终强调要能批判地吸收消化,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他谆谆告诫青年学生:“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学者言进化最高级为各具我性,次则各具个性,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同化。”^③这种态度在当时即使不是空谷足音,也是独树一帜。当时对待西方文化不是“视西学为神圣,视西人为帝天”的完全无“我”态度,就是冥顽不化、极端排斥的自我封闭态度。后一种态度的危害大家比较清楚,前一种态度的危害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一直到最近,还有人以为中国的问题是西化得不够。其实问题不在西化与否,而在于能否化西为我。没有自己理性的批判头脑,就既不能真正理解西方文化,更谈不上消化和吸收西方文化,使之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人一百多年来在接受西学上的根本问题不在不肯学习,而在未能以自己的头脑去学习。顽固封闭当然妨碍现代中国文化的建设,盲目西化同样无助于现代中国文化的建设。

① 林语堂:《想念蔡元培先生》,《大成》杂志,第67期。

② 《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92页。

③ 《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8页。

前者不要吸收,后者不要消化,结果自然是文化的空白。而蔡元培所主张的态度才是真正明智积极的态度。这种态度一方面注意批判吸收,另一方面又主张调和消化。显然,这才是真正建设性态度。

《文明之消化》这篇文章集中表达了蔡元培在这方面的思想。他一开始就提醒人们,要慎于吸收之始,“因为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毫无问题的”。吸收外来文化决不能“浑沦吞之”。当初“印度文明之输入也,其滋养果实为哲理,而埋蕴于宗教臭味之中。吸收者浑沦而吞之,致酿成消化不良之疾。……欧洲文明,以学术为中坚,本视印度复杂;而附属品之不可消化者,亦随而多歧。政潮之排荡,金力之劫持,宗教之拘忌,率皆为思想自由之障碍。使皆浑沦吞之,则他日消化不良之弊,将视印度文明为甚”^①。蔡元培在这里首先强调的是批判地吸收,然后又指出调和消化的必要,如无此,则吸收亦必前功尽弃!“例如晋唐之间,虽为吸收印度文明时代,而其时‘庄’、‘易’之演讲,建筑图画之革新,固已显其消化之能力,否则其吸收作用,必不能如是之博大也。今之于欧洲文明,何独不然。向使吾侪见彼此习俗之殊别,而不能推见其共通之公理,震新旧思想之冲突,而不能预为根本之调和,则臭味差池,即使强饮强食,其亦将出而哇之耳”^②。蔡元培这篇文章的理论前提是中西文化并非截然相异,而是异中有同。正因为相异,才有吸收消化的必要;正因为异中有同,即有普遍共同的原则,才有吸收消化的可能。此外,还必须具备消化的能力,即在传统中已有可以与外来文化相切相接的因素为接纳消化之基础,建设性的文化消化才能成为现实。

① 《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467—468页。

② 《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468页。

蔡元培的这篇文章是在1916年写的。三年后，中国文化界爆发了东西方文化的论战。争论的焦点是中西文化有无调和的可能。但论战双方的论证前提却大致是一致的，即都认为中西文化根本不同。主张调和的人的论点是：唯其不同，才要调和。“调和”在这里主要是“互补”的意思，而非完全融合。而反对的观点则是既然根本不同，就无调和余地。至于像胡适、吴宓那样承认文化共性而又不主张调和的，实际上是将某种文化的特点视为人类文化的普遍共性，而又忽略了中西文化的主要差异。无论是当时论战双方还是后来研究这一公案的思想史，似乎都未提到蔡元培的观点。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蔡元培的观点才是合乎事实并是真正建设性的。互补论想法很好，但要能真正互补，必须有一共同的基础。这基础只能通过融会贯通才能找到。可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占主流地位的却是“不能推见其共通之公理，震新旧思想之冲突，而不能预为根本之调和”的拿来主义和西化派。这种极端的态度恰恰导致食洋不化和一知半解，导致讲西学的人太多，懂西学的人绝少这样一种看似荒谬，实际上却有其必然性的反讽现象。中国近代接受西学之所以事倍功半，不正是因为过分强调中西文化的对立和差别，而拒绝采取调和融通的态度所致？

三

理解和接受不同文化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它一定要以自己的传统为理解的基础和出发点，这即使对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也不例外。当他从另外一种立场出发来反传统时，他一定先已对照传统，根据传统的问题来理解另一种文化立场了。没有这种基于传统的理解，他不可能以这种理解为根据去反对传统。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反传统主义亦是如此。反传统主义的潜台词是传统文化根本不行,只有西化才能解决传统造成的一切问题。但这种认识显然是由于对传统的负面理解和对照这种负面理解去理解西学造成的。反传统主义和全盘西化的立场可以对传统造成很大破坏,但却无法在引进西学,进而在积极的文化建设上有所建树。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反传统主义和全盘西化论实际上只是一种以文化为手段来最终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企图,目的是现实而非思想。所以无论对传统抑或对西学都缺乏一种理性的科学分析、批评态度。在那些反传统主义的作品中,更多的是激烈极端的口号与断语,却少见思想清晰冷静的理性运作。对传统基本上是草率定罪加以否定;对西学也缺少耐心去透彻了解和参悟贯通。因此,给中国文化留下的只是那么一种极端的态度,以及深刻的教训,却几乎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成就。

和许多近代激进的知识分子,包括陈独秀、胡适等人不同,文化与思想工作本身对蔡元培来说是目的而非手段。这个区别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其重要的意义。以文化思想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最终必导致意识形态而非学术思想。反之,建设现代中国文化才有真正的可能。但这个重大差别因为蔡元培支持新文化运动而被人忽视了。其实蔡元培对于新文化运动不是毫无保留的。就在1919年12月,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文化不是简单的,是复杂的;运动不是空谈的,是要实行的。”^①新文化运动虽然也曾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十六字方针,却往往只限于提倡与呐喊,最多也是象征性地“示范”一下,浅尝辄止。除了白话文学外,在其他文化领域均未建立现

① 《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61页。

代文化的真正基础。所以有人曾这样评价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在表面上看是成功，在骨子里看是失败。成功的象征是：思想解放，白话文流行，社会主义得人信仰。失败的象征是：哲学系统未建立，科学环境未造成，民主精神未显著。”^①其所以如此，端在新文化运动骨子里是以改变现实政治为根本目的，文化运动在他们只是达到此一目的的手段。蔡元培则不然。他始终把学术思想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来追求。他认为“精研学理，对于社会国家人类有最有价值的贡献”。而“我国近年所以民俗日偷，士风日蔽者，端由于师法坠落，学术消沉”^②。但“二十世纪的竞争，是学术的比赛……我们想要挽救我们垂危的局面，恢复我们固有的光荣，惟有从学术方面努力研究”^③。所以他始终认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主要责任是研究学问。他为此把北大的宗旨定为“为学问而学问”^④，认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和学生的觉悟之一，就是自动研求学术^⑤。这个论断当然主观成分居多，不一定符合事实。但从他对五四运动的这个评估也可以看出他和陈独秀、胡适等人的上述区别。

从表面上看，蔡元培自己好像也并未严守“为学问而学问”的立场，他强调学问和学术似乎还是为了“救国”。但是，他并非是以学问作为救国任意使用的工具，从而最终不惜歪曲学问，而是认为唯有一心追求学问，从中求得知识和真理，才能有济于国家民族。因此，学问和真理本身就是目的，追求学问和真理就是在救国，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他注重的不是通过一时奔走

① 萧一山：《一代宗师蔡子民先生》，《学术季刊》第2卷第2期。

② 《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116页。

③ 《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491页。

④ 《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263页。

⑤ 《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219页。

呼号即可达致的“一时之唤醒”，而是“永久之觉醒”，这就“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粹其品性，必难幸致”^①。所以他毕生致力于学术教育工作，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②。虽然在一个“物质文明之当王，拜金主义盛行”的时代，他的这种主张“几乎无不被目为迂阔”，但蔡元培仍能身体力行自己的主张，通过自己卓绝的努力，为建设现代中国文化做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

虽然由于长期从事领导教育的行政工作，在开拓中国现代教育事业上耗费了大量精力，以致没有留下多少纯学术著作，但蔡元培一直不能忘情于纯学术研究工作，并始终以无法抽身专心从事学术研究为憾。即便如此，他仍为现代中国文化的建设做出了实质性贡献。他除了引进介绍西方的哲学、民族学、美学、伦理学等等新知外，还对传统学术进行了新的阐释。本文选所收的《中国伦理学史》、《支那之专制政体》、《中国教育的发展》、《〈新唯识论〉序》、《〈俞理初先生年谱〉跋》、《孔子之精神生活》、《〈人与地〉序》等著作即是他这方面努力的成果。他关于美学、美育和教育学的著作，如收在本文选中的《学堂教科论》、《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华法教育会之意趣》、《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以美育代宗教说》、《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教育之对待的发展》、《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教育独立议》、《美育》等，都具有开创性意义。这种开创性意义不仅在于它们传播了许多新的知识和观念，还在于它们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真正融贯中西文化传统后产生的第一批硕果。

① 《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13页。

② 《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13页。

蔡元培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与他正确的方法论立场是分不开的。一方面,由于他将学术著作本身看作目的,所以他始终坚持研究学问要从弄通学理着手。只有这样才能举一反三,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譬如吃饭的时候,问小儿饭从哪里来的?最浅的答语是说出在饭桶里,进一步说是出在锅里,再进一步,说是出在谷仓里,必要知道探原到农田上,才是能造饭的,不是专吃现成饭的人了”^①。只有在学理上根本理解了,才能融会贯通,不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以学术本身为目的,放弃急功近利的态度始可。但不少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却正是以急功近利的态度来对待西学。胡适之于实用主义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不是在学习真正弄懂实用主义,而是从自己的功利心态出发,将它狭隘地理解为一种万能的“方法”,实际上是将它当做“术”而非“学”。这样,实用主义学理上的重要根据和创见就被根本忽视了,使得实用主义在相当多的国人心目中几乎成了“市侩哲学”的代名词,而它的理想主义情怀,道德实践诉求和形而上学意义几乎一直不为国人所知。

蔡元培当然也主张学习西学归根结底要能为我所用;但正因为如此,必须先弄通学理,中国需要的是“必须有熟练技能而又深通学理的人”^②,因为只有把学理弄通,才能真正掌握一种新思想,将其融进自己的思想文化中。但仅仅这样,还不足以建设现代中国文化。在接纳吸收西学以为建设现代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资源时,一方面要能客观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仍需有一个中国的衡准取舍构架,因为毕竟“国体、地势、风俗习惯不能无

① 《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42页。

② 《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42页。

异也”^①。在大举输入西学的时代，倘若“不得吾族固有之思想系统以相为衡准，则盖将旁皇于歧路”^②。但这决不意味着像极端的文化民族主义者那样，什么都是“吾国固已有之”，而是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出或阐发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因素。它既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批判；既是吸收，也是创新。不仅要中学通，也要西学通；不仅要两者都通，也要两者贯通。“是故如我国探理之学，由六经、诸子以推于名臣硕儒论议语录之属，抉择而演绎之，而后证之以西国理论，则无方凿圆枘之患。而我国探迹之学，由现行事例以追溯国初掌故，与夫历代制度之沿革，事变之孳乳，知其流弊之所由，而后矫之以西国政治，则无胶柱鼓瑟之患”^③。这是蔡元培对待中西文化关系上的一个根本的方法论原则。他自己的学术工作始终贯彻了这一原则。

四

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始终把道德作为根本目的和终极关怀来强调。近代知识分子谈道德的并不少，五四时《新青年》等杂志还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为号召。但是，他们并未将道德本身作为终极目的来追求，更无古今中外许多主要的道德学说所有的那种形而上关怀为基础，而只是以提倡新道德为达到救亡目的和自身行为可以不受约束的策略及权宜性手段。这样，所谓新道德在他们那里往往只是一些抽象空洞的口号，缺少实质内容，也根本没有康德赋予道德的

① 《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125页。

② 《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页。

③ 《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125页。